

在日常生活中:晋绥边区农村剧团演剧研究

——以首府兴县为例

李成生^{1,2} 姚春敏³

(1.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2.吕梁学院 历史文化系,山西 吕梁 033001;
3.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摘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晋绥边区的群众戏剧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农村剧团和秧歌队纷纷成立,晋绥首府兴县作为群众剧运的榜样,演剧活动尤其活跃。农村剧团成员以村内青年农民为主,演出时间主要是在春节和其他节庆日,戏剧剧本主题集中在减租生产、文化教育、拥军支前与百姓翻身等方面。农村剧团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宣传的有力助手,它切实推动了农村的实际工作,促进了社会动员,并且通过演剧重塑着这一时期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革命与演剧交融共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进入了农村日常生活。

【关键词】晋绥边区;农村剧团;兴县;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4-0139-10

In Daily Life: Study on Rural Troupes Performing of Shanxi-Suiyuan District: Taking Xing County as an Example

LI Chengsheng^{1,2} YAO Chunmin³

(1.School of Drama and Film,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2.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yuliang University, Lyuliang 033001;3.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00)

Abstract: After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by Mao Zedong in 1942, the mass drama movement was in full swing in Shanxi-Suiyuan Revolutionary Base. Rural troupes and Yangko teams were set up one after another. Xing County, the capital of Shanxi-Suiyuan, was especially active as a model of mass drama movement. The members of the mass troupe were mainly young farmers in the village. The theme of the play wa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on such aspects as rent reduc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supporting the army and turning over the people, and the performance time was mainly in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other festivals. Rural troupes became powerful assista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olicy propaganda. They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practical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promoted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reshaped the values and spiritual outlook of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their performances. Revolution and drama blend in symbiosis, and in a silent way into the rural daily life.

Key words: Shanxi-Suiyuan District; rural troupe; Xing County; daily life

【收稿日期】2022-1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戏曲文物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17ZDA244);吕梁学院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院政[2021]101号)

【作者简介】李成生(1981-),男,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姚春敏(1972-),女,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各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戏剧运动,农村剧团和秧歌队纷纷成立,群众剧运如火如荼地开展。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传统戏剧的革命化改造、编演新剧和戏剧的革命动员与社会效用等方面,这些成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根据地农村群众戏剧运动特别是这一时期根据地的革命和宣传工作不无裨益^①。但是,区别于以往高台教化的传统戏剧表演,根据地农村群众戏剧是一种特殊的表演模式,这种接地气且深入农村日常生活的戏剧,其具体的组织情况、人员构成、演出活动和戏剧剧本如何?它又是怎样全方位进入农村日常生活的?这些却鲜有论及。有鉴于此,笔者以山西省档案馆珍藏的晋绥边区政府对其首府兴县13个农村剧团和秧歌队(1944—1946)的调查档案为主,再辅以《抗战日报》、地方文献等多种资料,通过对其组织情况与人员构成、演出活动和戏剧剧本的微观分析,一方面揭示晋绥边区农村剧团和秧歌队(文中简称“农村剧团”)的基本演剧情况,另一方面深入论述农村群众演剧究竟是如何进入日常生活中的。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组织情况与人员构成

兴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吕梁山腹地,传统戏曲主要有道情、中路梆子和秧歌小戏等,清末民初,盛极一时。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山西沦陷,兴县的传统戏班相继解散,艺人失业,颠沛流离。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区政府成立,首府驻扎在兴县,农村群众戏剧活动接续传统逐渐活跃起来。晋绥边区的七月剧社^②把流传在陕西和晋西南的眉户剧和晋中秧歌剧介绍到兴县,这两个剧种此后成为群众业余剧团的主要剧种^③。1943年4月7日,晋西民间戏曲研究会在兴县召开,之后群众性的戏剧活动蓬勃发展,城关和一些较大的村落如蔡家会、黑峪口、魏家滩、康宁、水磨滩、胡家沟、安家庄和固贤等村相继建立起业余剧团,1944年到1946年达到高潮。至1949年,全县业余剧团发展到20多个,演员500多人^④。

根据档案调查资料^⑤,兴县农村剧团主要是在1944年至1946年成立,其状况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有旧基础的,这是主体,在13个农村剧团中,有6个属于此种情形。所谓旧基础指的是在原来村落

① 代表性论文主要有韩晓莉、行龙:《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贾冀川:《论解放区戏剧》,《戏剧》2012年第2期;崔一楠、李群山:《“植入”革命:华北根据地的秧歌改造》,《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4期;彭岚嘉、吴双芹:《新秧歌剧运动:革命时代的政治与娱乐》,《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张宏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戏剧研究》,《党的文献》2017年第2期;韩朝建:《乡村剧团与社会动员——以1944年河北阜平县高街〈穷人乐〉的编演为中心》,《民俗研究》2018年第3期;张自春:《经验互助与群众创作:“〈穷人乐〉方向”与解放区——新中国的群众文艺运动》,《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郑立柱:《戏剧调适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福建论坛》2020年第2期;小田:《抗战时代文艺人的思想革命——对浙东根据地“的笃戏”改造的考察》,《河北学刊》2022年第2期;周维东:《“运动”中的文艺法则——从延安时期“二流子改造”运动看新秧歌剧创演》,《文艺研究》2022年第5期。

② 1939年7月1日,时任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和区党委党校负责人朱昔筹建的一支文艺宣传队在山西省隰县川口镇诞生,张稼夫取名为“七月剧团”,后改为“七月剧社”。

③ 李象耕:《建国前兴县革命文艺概况》,兴县在川老同志革命回忆录征集小组:《兴县老干部回忆录》(内部),1991年,第91-92页。

④ 贾维桢、尚永红、孙海声主编:《兴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98页。

⑤ 山西省档案馆珍藏的晋绥边区政府《1946年5至8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档号:A141-0001-0028-0002),该调查表是精心设计的,分为“组织情况”“工作活动”“剧本”“经费”“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有何困难及对今后活动意见”等六大部分,全面反映了兴县农村剧团和秧歌队的基本面貌。这份档案保存完整,内容丰富,详实具体,对于了解兴县乃至晋绥边区的农村剧团和秧歌队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旧有的秧歌队基础上改造的。第二种是来自外界帮助的,主要是区政府(公所)^①和专业革命剧团的帮助。如一区孙家庄村群众剧团和六区蔡家会村有鸿剧团有“区上的帮助”,二区高家村群众剧团和杨家坡村杨家坡剧团有晋绥边区专业剧团“七月剧社的帮助”^②。但这两种类型并无严格区分,如二区黑峪口村剧团是既有旧基础,又有专业剧社的帮助。第三种为新成立的,如一区廿里铺村青年少年秧歌队是在1945年冬学中在学校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西关村群众剧团和东北关村群众秧歌队都是“群众酝酿动员”成立的^③。在这些农村剧团中,村干部、劳动英雄和小学教员起着骨干作用,所有的剧团都有村干部参加,剧团领导人几乎都担任着村内重要职务^④。

表1 兴县13个农村剧团人员构成概况

名称	地址	共有 人数	男	女	儿童	英雄	干部	教员	艺人	其他
青年少年秧歌队	一区廿里铺村	26	24	2	16		2	1		民兵7人
群众剧团	一区孙家庄村	25	20	5	2		3	1	3	
群众剧团	二区高家村	40	35	5	10	1	6	1	2	
杨家坡剧团	二区杨家坡村	26	26		2		6	1		
黑峪口剧团	二区黑峪口村	40	37	3	21		3		12	4
群众剧团	三区横城村	22	10		10		1	1		
秧歌队	五区裴家川口村	30	26	4			6			
群众剧团	五区石门庄村	18	17	1	4	1	4	1	1	
有鸿剧团	六区蔡家会村	34	34		7	1	3	3	2	
群众秧歌队	西关村	40	33	7	8	3	5	2	5	17
业余剧团	南关村	25	25		1		2		10	12
秧歌队	南关村	53			7	1	5		7	33
群众秧歌队	市区东北关村	30	5	4	12	1	7	1		

表1中,兴县13个农村剧团在参加人数方面,从近二十个到五十余个不等,平均人数为31.46人。男女比例方面,以男性为主,有的剧团纯粹是男性而没有女性参加,如南关村业余剧团、蔡家会村有鸿剧团

① 1940年1月兴县解放,抗日民主县政府废除编村建制,改为县下设区,区下设行政村,将兴县全县划分为8个区,同年8月调整为6个区,行政村设村公所。一区区公所设交口(后迁二十里铺),辖水磨滩等11个行政村;二区区公所设黑峪口(后迁北坡、高家村),辖李家湾等9个行政村;三区区公所设康宁,辖康宁等10个行政村;四区区公所设官庄(后迁任家坡、固贤),辖固贤等11个行政村;五区区公所设魏家滩(后迁瓦塘),辖木崖头等12个行政村;六区区公所设蔡家会,辖蔡家会等8个行政村。1942年7月,增设兴县市政府(驻城关,隶属县府),直辖东关、西关、南关3个街公所。直到1950年4月,全县仍为6个区和1个区级市政府。参见贾维桢、尚永红、孙海声主编:《兴县志》,第4-5页。

② 《1946年5至8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1946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28-0002。

③ 同上。

④ 五区石门庄村群众剧团团长高枝留担任村副中队长,六区蔡家会村有鸿剧团团长刘有鸿是边区劳模,剧团的指导员为村四完小校长,市区东北关村群众秧歌队有7位干部参加,秧歌队队长李明庚担任村自卫分队长,西关村群众秧歌队队长任效忠担任西关的抗联主任,同时又是该村纺织合作社的经理。《1946年5至8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1946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28-0002。二区杨家坡村杨家坡剧团的领导和村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村长杨世槐是剧团前任团长,劳英温象拴十分关心剧团工作,亲自参加演出。剧团本身也培养了不少干部,如主任杨耀,民兵小队长杨模子等。参见伍陵:《介绍杨家坡群众剧团》,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下)》,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47页。

和杨家坡村杨家坡剧团。但是大部分剧团都有女性演员,如西关村群众秧歌队的女性演员有7人。此外儿童的比例十分惊人,廿里铺村青年少年秧歌队,总人数26人,儿童16人,占61.5%。黑峪口村剧团,总人数40人,儿童21人,占52.5%。横城村群众剧团,总人数22人,儿童10人,占45.5%。东北关村群众秧歌队,总人数30人,儿童12人,占40%。这些剧团中儿童占了很大比例,有的甚至超过一半。再者,不少专业艺人也参与其中,如南关村业余剧团有10位艺人参加,南关村秧歌队有7位艺人参加,西关村群众秧歌队有5位艺人参加,黑峪口村黑峪口剧团有12位艺人参加。总体来看,专业艺人的分布极不均衡。

上见,1944—1946年,兴县的13个农村剧团中,村干部和劳动英雄一般是组织者和指挥者,小学教员是村内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剧团的领导核心。剧团参加人数在30人左右,不少剧团中儿童占有很大比例,靠近城关的行政村参加人数较多。性别比例方面,总体以男性为主,女性也开始崭露头角,虽然人数较少,但也是破天荒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男女平等观念隐现,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从剧团所在空间位置来看,城关各村和黑峪口村为集镇所在村落,商贸较为繁荣,经济较为发达,这些剧团中有许多艺人参加,因而其演剧水平远超其他剧团。

二、演出活动融入乡民生活

农村剧团的演出活动主要以节庆日和村落为表演时空,融入乡民的生活中,成为其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档案调查资料,兴县农村剧团搬演的时间基本是依托当地村落传统的民间节日集会、纪念会和群众大会,其中春节与旧集会成了群众演剧的黄金时段。

一区廿里铺村青年少年秧歌队,利用旧集会演出2次,1946年阴历正月十二、十三日在本村演出,十五日在城关演出。一区孙家庄村群众剧团,1946年正月初二出演,演出共12次,计15天。二区杨家坡村杨家坡剧团,成立以来演出62次,在春节宣传中去各个自然村和别的行政村演出。二区黑峪口村剧团,1944年冬成立以来演出二十几次,在蔡家崖、城内等地因上级调演及召开大会和纪念会,利用旧集会等演出。东北关村群众秧歌队,1946年成立,演出2次,为了刺激女二流子并影响群众积极参加生产,在水泉湾和北关两地利用旧集会演出。^①

空间上,受交通和地理条件所限,农村剧团演出的地点主要以本村和周边村落为主。村际表演成为加强乡村社会联系的交往方式。

一区孙家庄村群众剧团,利用各村旧的平安会,在吕家庄、王家崖、王家沟、庄子上、廿里铺、爱峪关、贺家梁和南海沟等村演过。三区横城村群众剧团,在王家圪台、吴儿申、武明村和佃峁都演出过。五区石门庄村群众剧团,自1946年阴历正月初六开始,共演出7次,分别为本行政村5次,瓦塘1次,魏家滩完小“四四”儿童节1次。六区蔡家会村有鸿剧团,1945年正月起在张家坪、武家峁、罗峪口、枣林坡、狮子凹、何子坪和蔡家会演出,多半是配合正月闹红火,还有配合村选,召开群众大会等。^②

上见,农村剧团的演出活动完全契合村落节奏,实现了表演时空与乡民日常生活的同频共振。正因这种特征,晋绥边区和兴县政府在1945年和1946年春节期间都组织过公演竞赛。《抗战日报》1945年3月9日第2版以《文教大会筹委会举办秧歌队联合公演》为题对1945年春节期间兴县二区的秧歌公演进行了报道:

边区文教大会筹委会于旧历正月17日召集兴县二区各村秧歌队举行公演竞赛。是日,15

①《1946年5至8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1946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28-0002。

②同上。

个村的秧歌队从大川、从山沟先后涌向军区司令部驻地的会场里。在喧天的锣鼓声中,胡家沟军民秧歌队的高跷首先表演,接着赵家川口、杨家坡、黑峪口等村依次演出群众自己写出的剧本。杨家坡的节目是《刘成龙诬告(告状)》(道情),胡家沟的节目是《刘铁牛(二大流)转变》,这个角色由一个前年转变了的二大流扮演,转变过程表现得很生动。黑峪口的节目是《回心转意》,舞台上角色很多是民间旧艺人,他们用山西梆子的形式非常技巧的表现出新的内容。……第二天,依次由杨家坪、碧村、任家湾、李家湾等村继续演出^①。

锣鼓喧天的群众剧团汇演,极大地推动了兴县农村剧团的演出热情,并得到了晋绥边区政府领导的首肯和表扬^②。这次会演由兴县二区各村秧歌队参加,可以说是兴县农村剧团的一次检视,晋绥边区政府通过此种方式宣传了农村群众剧运的方针政策,肯定了农村剧运。此后,群众积极性更加高涨,兴县乃至全边区的农村剧运蓬勃开展起来。1946年春节,边区政府在兴县又举行了一次全县的秧歌会演,《抗战日报》1946年2月24日第2版以《三十个军民秧歌剧团在兴县城举行大比赛》为题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报道,这极大地刺激了群众剧团创作和改造村落日常生活的热情^③。

需要指出的是,在演出活动中,村干部的作用尤为明显。在表演过程中,不少村干部既是组织者又承担着演员的双重身份,一般在剧中扮演正义的执行者,以此进入演剧中的日常。

另外,剧团装备也是演出活动的重要构成。依据档案调查,其分为“文武场家具”“服装”“幕布”“化妆”和“道剧”五个部分。“文武场家具”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沿用“旧家具”,另一种是借用。在这些剧团中,有“服装”的只有3个剧团。杨家坡剧团共有26人,男女衣服有“十四件”,横城村群众剧团共有22人,有“男女衣服十件”,这是较好的剧团。而南关村业余剧团共有25人,服装仅有“青色大袍一件,黄色大袍一件,青色小布衫一件,青色帽子一顶”。“幕布”统计上,只有南关村业余剧团有“六块幕布”,其余剧团则没有。化妆上以演员自备(集体)或化妆费由演出当地负担,可知化妆应较为简单。“道剧”统计上,各剧团几乎没有^④。

可见,演剧装备和经费的短缺是各农村剧团面临的主要困难,他们采取种种途径加以解决。如蔡家会村有鸿剧团“文武场家具借用旧社的,闹秧歌、闹道情自备了一面小锣,新剧的服装随演随借,旧剧的服装赁用何子坪的。幕布借门帘和布缝用,演完了再还人家,化装费(化妆)由演的当地负担”。孙家庄村群众剧团的“家具”是向“外村借用,用完后归还”。杨家坡村把“群众送了古坟的树卖了2000元,斗争地主私穿本村过去的秧歌衣服,……还有自己种的地来补助。”甘里铺村青年少年秧歌队没有“家具”,配奏的时候只能借排^⑤。可以看出,各农村剧团在演出时借用“家具”是主要的解决办法,其他作为临时补充。

要之,兴县农村剧团演出时间主要是在春节和其他节庆日,相对确定。演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本村和周边村落,以及行政村下辖的各自然村,跨区域演出不多,会演和调演除外。虽然各农村剧团的演剧装备和经费严重不足,但剧团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基本能保障其正常的演出活动。

三、戏剧剧本的生活化叙事

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农村剧团“集体创作”和“组织生产”是戏剧剧本产生的主要手段和基本特

①《文教大会筹委会举办秧歌队联合公演》,《抗战日报》1945年3月9日第2版。

②晋绥文联主席亚马同志和晋绥行署杜心源处长出席参加,并且表彰了群众剧团。

③《三十个军民秧歌剧团在兴县城举行大比赛》,《抗战日报》1946年2月24日第2版。

④《1946年5至8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1946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28-0002。

⑤同上。

征。剧本以村落日常生活为主要叙事内容,表达了乡民的审美情趣,具有浓郁的群众性和革命性。根据调查整理,兴县 13 个农村剧团的戏剧剧本情况如下:

表 2 兴县 13 个农村剧团戏剧剧本概况

名称	地址	剧本名称	外来的	自编的	材料来源
青年少年秧歌队	一区廿里铺村	《能备荒》《比本领》《栽树》《小贩翻身》《小姑贤》《好媳妇》	4	2	群众的备荒情形与劳武(劳力和武力相结合)情形
群众剧团	一区孙家庄村	《小姑贤》《黑板报》《瞎子算命》《小放牛》《刘生海转变》《兄妹开荒》《纺织好组长》《四劝》《三娘教子》	4	5	买剧本及自己村的事情,按事实编写
群众剧团	二区高家村	《定计划》《查租》《黑板报》《母老虎转变》《瞎子算命》《算账去》	3	3	按村内的实际行动编出
杨家坡剧团	二区杨家坡村	《向劳动英雄学习》《刘成龙告状》《杨满仓办喜事》《男耕女织》《埋包袱》等 21 个	6	15	群众当中典型材料
黑峪口剧团	二区黑峪口村	《回心转意》《烂牛肉》《夫妻英雄》《新旧光景》《活路》《夫妻二流子》《参加生产》《好庄稼》	2	6	采访本村事实
群众剧团	三区横城村	《减租劳军》《白玉江拥军》《新教子》《扫硝》《闹春耕》	3	2	白玉江救护两个伤兵的事实
秧歌队	五区裴家川口	《王德锁减租》《黑板报》《三女婿拜年》	3		
群众剧团	五区石门庄村	《吃亏上当》《小姑贤》《好媳妇》《劳军》《活路》《破除迷信》《贵中口》	5	2	1945 年冬减租中得来
有鸿剧团	六区蔡家会村	《闹嘴舌》《打镰刀》《吃亏上当》《栽树》《夫妻识字》《大家好》《新旧》共二十几幕	14 或 15	6 或 7	如《闹村选》,在 1945 年选村长时配合编的,其他都是如此情形
群众秧歌队	西关村	《好媳妇》《少先队出洋戏》《减租生产大家好》,因为时间关系,只在台上演过第三个,其余的是街头预演	1	2	村内实际
业余剧团	南关村	《大闹元宵节》		1	
秧歌队	南关村	高跷、旱船			
群众秧歌队	市区东北关村	《好冬学》		1	本地实际材料

粗略统计,兴县 13 个农村剧团演出的剧本在 80 本左右,形式采用以当地群众熟悉的秧歌、眉户、道情和民间小调为主,几乎都是小戏,短小精悍,形式灵活。话剧和山西梆子在杨家坡剧团采用过,因该剧团是晋绥边区的模范剧团,成立时间相对较长,且有七月剧社的帮助,易于接触话剧等新形式。黑峪口剧团亦用山西梆子演出,因为该村“稍有旧基础”,且参加剧团的有民间艺人 12 人,他们熟悉山西梆子的形式^①。

概言之,兴县农村剧团的剧本来源分为“外来的”和“自编的”两类,外来的剧本是相对于各村自编的剧本而言。从调查表可知,边区政府鼓励农村剧团根据村内工作的实际情况“集体创作”和“自编自演”剧本。杨家坡剧团的集体创作很有代表性:

剧团的编剧,是由村干部、劳英和剧团同志事先共同研究——该宣传什么去推动村里的工作?村里有些什么人、事应该表扬与批评?然后大家推出几个人支架子,再由众人编出剧中

^①《1946 年 5 至 8 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1946 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 A141-0001-0028-0002。

人的台词,小学教员充当记录。在以后排练与演出中,还经常根据观众的意见与实际工作的发展不断的加以修改。从此可以看到:剧本主题的选择是根据村中工作的要求,内容题材则多采自村中的人物与事迹。创作方法是采取集体创作。因为剧中人事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所以编剧就不太困难^①。

其他村自编剧本的编剧材料也是源于村内实际,从表中“材料来源”一栏中可以看出,甘里铺村根据群众的备荒情形自编了《能备荒》,横城村根据白玉江救护两个伤兵的事实编了《白玉江拥军》,蔡家会村在1945年配合村选时编出了《闹村选》等。这些皆是依托本村日常生活实际和村落百姓常见的现象改编而成的。

剧本内容立足本村实际,结合当时的革命时事,反映了晋绥边区兴县农村的深刻变化,这从剧目上就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如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剧有《查租》《减租劳军》《王德锁减租》等;反映大生产运动的剧有《闹春耕》《定计划》《兄妹开荒》《纺织好组长》等;反映改造二流子运动的剧有《埋包袱》《夫妻二流子》等;反映拥军支前的剧有《白玉江拥军》《劳军》《扫硝》《地雷阵》等;反映冬学教育、识字运动的剧有《黑板报》《好冬学》《夫妻识字》等;反映边区新生活、百姓翻身的剧有《小贩翻身》《向劳动英雄学习》《杨满仓办喜事》《新旧光景》等。

在演出之后,一些较为优秀的剧本陆续被刊登出来,如《一切为了前线》刊登在1945年9月23日和24日的《抗战日报》(第4版)上,剧本《杨满仓办喜事》刊登在1946年6月出版的《人民时代》(半月刊)第十、十一期(合刊)和第十二期上,供各农村剧团交流使用。

上见,这一时期兴县农村剧团的演出剧本除小部分来源于传统剧目改编之外,绝大多数为革命时事剧,从田间地头农村生活到笔头案头再到撂地表演,瞬间转换。这些时事剧的基本素材均来源于村落日常生活,剧本结构和结局大体相同,一般以村落部分群众因觉悟不高而被教育,然后悔悟并立志进入革命新日常中为基本叙事,等等。剧本内容以本村身边人的日常为主要特征,群众剧团因此成功营造了根据地的农村舆论场。

四、革命进入农村日常

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它“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1943年3月,中央文委确定了根据地的剧运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台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这些重要的政策和指导原则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演出要配合当时的政治工作和中心任务,即“政治标准第一”;二是选择“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

(一)推动农村中心工作,促进农村社会动员

兴县农村剧团根据本村实际,紧密结合中心工作,演剧以在实际中所起的作用为标准,务使演的戏对村中工作有所帮助。该调查表较少关注农村剧团专业表演的问题,然而对群众反响却十分重视,在表中专门把演出作用和效果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如杨家坡剧团自成立后,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编写新的剧本演出。“《埋包袱》改造了二流子,《刘成龙告状》开展了高本泉的工作,《一切为了前线》发动了群众支援前线。”高家村群众剧团“1945年巩固变工组,发展了纺织,群众最欢迎《母老虎转变》。”横城村群众剧团“在减租上,群众感到地主剥削的农民喘不过气来,群众最欢迎《减租劳军》。”^②凡此种种,不

^① 伍陵:《介绍杨家坡群众剧团》,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下)》,第746页。

^② 《1946年5至8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1946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28-0002。

一而足,充分说明,相比于演出技巧和技术而言,各农村剧团更加重视表演的成效和实际作用。

剧团的演出节目反映了农村每一阶段的工作并推动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成为农村开展工作和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抓手。1945年胡家沟军民秧歌队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集体创作了一个活报、一个儿童剧,同时排出一个《参选》(快板)和《歌唱毛主席》(花鼓),准备参加“七七”大会。秧歌队各队员都事先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使大家提前了解纪念“七一”“七七”的伟大意义^①。杨家坡剧团欢送新战士时编演了《青年自愿参军》,表扬模范,推动参军工作。春耕时演出了《男耕女织》,掀起生产上的热潮。民主运动中,《参选》戏揭穿破坏分子的阴谋,提倡沙里澄金选好人。抗日反攻开始,则编了《日本投降了》的报告戏,指出日阎合流的事实,并号召群众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②。1945年,兴县武家塔剧团在选举村长大会上演出了一幕防旱备荒的剧,当晚新选出的村长就抓紧群众积极推动防旱备荒^③。1946年春节期间,边区各机关、工厂、农村共三十个秧歌剧团在兴县城关举行大比赛。所有节目内容都和四大任务有紧密联系,其中以减租生产的为最多。经过评比,杨家坡夺得第一,大会特奖以“人民新生活的表现”锦旗一面。黑峪口团结旧艺人为人民服务做得特别好,艺术水平也比较高,他们的戏剧活动,推动了附近很多村庄的生产和工作,特奖以“民间艺术的先锋”^④。

在革命历史情境下,戏剧运动与政治运动始终相伴相生,以演剧来推进政治运动的开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动员策略^⑤。群众甚至以剧中人作为评判和衡量自己的标准,这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中心工作和社会动员,以致干部们认为演剧“比咱开十天会也强”“剧团是改造思想和推动工作的法宝”。

(二)开展农民文化教育,引发群众情感共鸣

出于“政治标准第一”的演剧,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回应其最为关切的现实问题,因而深受欢迎,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开脑筋戏”或“换脑筋戏”。东北关村的群众秧歌队演出《好冬学》后,“群众认识到新政权教育人真是苦口婆心,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总要把人教育好。”西关村根据真人真事自编的《减租生产大家好》演出后,效果显著。“在演减租那段事实时,有些地主说再不敢顽皮了,这样的话人钱两空,不如开明的顺利减了,演到了改造二流子,高海堂参加生产,有许多男女二流子说人家都能改好,咱就改不好?还是咱没骨石(方言,骨气的意思)。”^⑥杨家坡剧团的人员同时又是读报组组员,他们上地时抽空在变工组中进行读报。在剧团影响下,杨家坡老少妇孺大部参加了夜校和读报组,剧团在农村文化生活的普及上成为支柱^⑦。

1945年新年前几天,黑峪口剧团根据实际,六天编排了四个剧:《上冬学》《看英雄》《好庄稼》和《夫妻英雄》。1月2日在黑峪口演出《上冬学》时,一些观众低下了头,像在想什么。当《夫妻英雄》开始后,人们则大声地说:“瞧人家这两口儿,都带着红花,汉子是英雄!婆姨是英雄!一对对英雄!多体面!再看看那二大流架子,唉!实在没眉眼!”第二天,黑峪口村公所紧急召集全村60余个二大流开会,抓紧机会进行教育^⑧。至此,这幕“大戏”才落下帷幕,由此可见当时的演出情景和轰动盛况。很明显,这已经不是一次单纯的戏剧表演,观演合为一体,固有边界消解,演剧化入革命。这种氛围的戏剧演出,剧场已然变成了教育现场,能够使群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共情效应,最大程度地实现预期效果。

①《胡家沟军民秧歌队准备“七七”宣传活动》,《抗战日报》1945年7月8日第1版。

②吴钢、辛酉、张洪、伍陵:《介绍杨家坡剧团》,文联戏剧部编印,1945年,第2页。

③《兴县武家塔剧团演剧推动防旱备荒》,《抗战日报》1945年6月27日第2版。

④《三十个军民秧歌剧团在兴县城举行大比赛》,《抗战日报》1946年2月24日第2版。

⑤刘文辉:《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⑥《1946年5至8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1946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28-0002。

⑦吴钢、辛酉、张洪、伍陵:《介绍杨家坡剧团》,第6页。

⑧辛酉:《集体的突击——记黑峪口的秧歌队》,《抗战日报》1945年1月25日第4版。

正因为演的戏与当时当地观众思想情绪一致,就使得每一个戏都抓住了观众心理,观众终于从剧里接受了他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是从剧里得到启发而解决自己的疑难,或是从剧里大吃一惊发现了自己和工作中的问题^①。这起到了融盐于水、无色有味的文化教育功效,“他们已不只把它当做单单的娱乐来接受,而且当做一种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表现,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来接受了。”^②

(三)丰富农民娱乐活动,改变农村精神风貌

晋西北农村长期以来有玩社火、闹红火的民间文艺传统,演剧活动尤其是秧歌小戏更是异常活跃,遍布城乡。戏剧在农村社会有着独特的魅力,明恩溥描述道:“在中国观看戏剧的节日里,任何其他世俗的兴趣都得让道。一旦某一个乡村要举办戏剧演出的事情被确定下来,附近的村庄都将为之兴奋得颤抖。”^③

在节庆期间尤其是春节,兴县农村演剧活动十分频繁,常常延续数天,欢声震地,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是群众愉悦身心和集体狂欢的重要节日。农村剧团演出的革命时事剧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满足了群众的精神需求。如“廿里铺村群众喜欢的剧是《能备荒》《栽树》,孙家庄村群众最爱看《小姑贤》《瞎子算命》《纺织好组长》,石门庄村群众最喜欢的是《吃亏上当》《小姑贤》《好媳妇》,在西关村演出《减租生产大家好》时,群众说地主装的最好,他那个狡猾的神情都表现出来了。”^④1945年新年,黑峪口剧团在碧村演出时,热闹非凡,四个剧演了三个钟头,观众吵着说,戏太短了,要求重演一次。第二天,剧团在黑峪口演出,“山药蛋”有力而精彩的动作博得了观众的掌声和笑声,“山药蛋”的妈妈抿嘴笑了起来:“咪孩啦演的可不赖。”^⑤杨家坡剧团杨怀宝扮演《埋包袱》剧中的女二大流,一进门就往炕上一躺,懒腰一伸,烟瘾发作,有人劝她生产,她反而说:“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老娘娘就是这个样儿!”当杨怀宝把这些动作和表情与自己的角色结合出现在舞台时,观众笑得喘不过气来^⑥。前述,边区和兴县政府亦通过有组织的竞赛、会演等方式打破村域固有界限,扩大节日活动规模,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把节日狂欢气氛推向高潮。

与民同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府对待传统节日的主导思想,然而,娱乐并不是政府参与节日活动的主要目的,通过组织活动增强政权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实现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才是其目的所在^⑦。杨家坡剧团显著的成绩就是成功改造了平安会。“平安会是群众中流传下来的迷信集会,从正月初一起要闹七八天,请和尚,吹鼓手,还要摊钱,把一年的积蓄花费在和尚、香纸、蜡烛之上,还灌了一脑袋封建迷信思想。有了剧团,杨家坡不闹平安会了。表现新生活的艺术,代替了封建迷信的陋习,群众欢欣鼓舞,提着各式各样的红绿灯笼,歌唱着翻身的新曲子,和剧团一道扭起秧歌来。烧香拜佛,赌博耍钱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⑧高家村群众剧团为了配合工作,把正月平安会改为生产动员会。横城村群众剧团1945年和1946年正月,为推动生产,把旧日的平安会改为拥军爱民扩大生产会^⑨。中国

① 吴钢、辛酉、张洪、伍陵:《介绍杨家坡剧团》,第5页。

②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③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43页。

④ 《1946年5至8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1946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28-0002。

⑤ 辛酉:《集体的突击——记黑峪口的秧歌队》,《抗战日报》,1945年1月25日第4版。

⑥ 吴钢、辛酉、张洪、伍陵:《介绍杨家坡剧团》,第4页。

⑦ 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1页。

⑧ 吴钢、辛酉、张洪、伍陵:《介绍杨家坡剧团》,第5-6页。

⑨ 《1946年5至8月份群众、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军民等剧团或秧歌队调查表》(1946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28-0002。

共产党通过柔性介入,移风易俗,融教于乐,倡导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娱乐方式,实现了最广泛的宣传效果,重塑了根据地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编新时代的戏,编老百姓心里想的事”成为新的风尚。

结 语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创建了晋绥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晋绥边区农村剧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首府兴县作为群众剧运的榜样,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在农村剧团中,演员主要是来自本村青年农民,村干部、劳动英雄和小学教员起着领导骨干作用。演剧活动主要在农村节日集会尤其在春节期间且较为频繁。戏剧剧本紧密结合根据地时事,集体创作,自编自演。在农村演剧中,因为观众是地缘范围内的熟人,且表演内容极接地气,无论演员还是剧本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来自身边,这与传统才子佳人剧离人千里之外的观看感受完全不同。对于村落乡民而言,戏剧中的陌生化天然无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推动下,根据地农村剧团成为中共政策宣传的有力助手,革命与演剧交融共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进入了农村日常生活。

(责任编辑:李良木)

《中国古代耕织图概论》出版

中国农业博物馆王潮生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概论》由中国国家出版基金支持,已于2023年6月由花山文艺出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是中国自五代时期产生木刻耕织图像至宋、元、明、清一千多年来,以图像史学等方法全面、系统研究和论述中国古代耕织图的学术专著。

书中汇集了宋、元、明、清时期较完整的,成系列的耕织图及有关图像1000余幅,并收录有中国明代耕织图日本翻刻本及古朝鲜版耕织图,是目前我们已知最全版本。书中并附有历代帝王、名人有关耕织图题诗400余首,图与诗文相配,极其稀有珍贵。

该书对耕织图的历史渊源,耕织图的发展脉络,耕织图内容释义,耕织图蕴含其中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内涵以及古代倡导宣传耕织图所起的积极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完整、系统、深入的研究,论证和分析,阐述。该书内容丰富,考证有据,读者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千年来中国古代农耕与蚕织各个生产环节,生产流程,生产工具,操作方法,以及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农耕与蚕织的历史文化,中国古代各地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及植桑,养蚕,织帛真实、具体的情景。

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古代耕织图研究领域的空白。读者可通过花山文艺出版社微店、花山文艺出版社抖音店铺购买,有优惠折扣。(本刊讯)